

明代诗文论争研究

冯小祿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明代诗文论争研究

冯小祿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诗文论争研究 / 冯小禄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7

ISBN 7-222-04758-1

I. 明... II. 冯... III. ①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明代②古典散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07.22②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0649 号

责任编辑: 赵石定 冯 琰

装帧设计: 陶汝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明代诗文论争研究
作 者	冯小禄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4758-1
定 价	23.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引 论	1
概 说	12
一 明代诗文论争的广泛激烈	13
二 明代诗文论争的分类	24
三 明代诗文论争的分期	37
上编 文学政治时代的诗文论争 (洪武元年至正德元年)	41
一 明初围绕杨维桢展开的争论	43
贝琼“词涉夸大”考索	45
王彝“文妖”之评	49
原因探析	55
二 师古与自得——明初的探讨	57
师古之必要性	60
如何师古	65
成功之师古	70
三 “宋绝无诗”论考	
——唐宋诗之争(一)	73
黄容批判“宋绝无诗”论	77
刘崧前后的宗唐风气	84
刘崧前后的抑宋风气	89
四 民众、台阁与理学、心学	
——唐宋诗之争(二)	93





宗唐和卫宋的创作、诗话	94
台阁作家的崇盛唐诗观	99
理学的为宋诗辩护	105
心学家的诗歌态度及唐宋诗观	112
五 唐宋元诗三朝合论	
——唐宋诗之争(三)	120
三朝诗合论	121
宋元诗比较论	130
中编 文学复古时代的诗文论争 (正德元年至万历十八年)	137
一 由习尚到宗法的传播	
——七子派复古口号考源	140
二 “改趋”与“守化”	
——徐祯卿与李梦阳之争	153
“改趋”之争	154
“守化”之争	161
三 同异之辨	
——吾谨与李梦阳之争	169
四 李何之争古今言说述评	181
李何之争现当代言说述评	181
李何之争平议	188
李何之争的明代言说述评	201
五 变:文质人移	
——以顾璘为中心	212
早年劝陈沂弃宋	217
晚年与崔铣、陈鹤论诗文	223
对唐宋派的态度	232

六	时尚——批判前七子派	236
	前七子派的批判	237
	杨慎等人的反思	242
	理学家的批判	248
七	在前后七子派之间	
	——唐宋派的离合与差异	255
	风节与宗法的离合	256
	格局与心态的差异	267
八	从论文看唐宋派的发展与要求	
	——以茅坤为中心	273
	唐宋派的发展	275
	唐宋派的要求	284
九	后七子的派内派外之争	
	——以李攀龙为中心视点	292
	宗派和家传作风	296
	批判李攀龙	302
十	后七子的派内派外之争	
	——以王世贞为中心视点	307
	派内之争的王世贞	308
	派外之争的王世贞	310
	南北之争的王世贞	318
	“泛应众”的晚年风度和“泛应众”的 晚年诗学	321
下编	文学师心时代的诗文论争 (万历十八年至崇祯末年)	329
一	师心与晚明的“对作”	
	——以公安派为中心	331





从理、辞的呈现看公安派的师心	331
公安派与“对作”	336
进入文学史与自我“对作”	341
二 三方论坛	
——公安派、竟陵派与后七子派的论争	350
李维桢的批判与自我批判	352
公安派的批判、反批判和自我批判	364
竟陵派的批判与自我批判	370
三 “功臣”论	
——明代诗文论争的重要认识	377
“功臣”论的出台	377
“功臣”与流派的关系	383
“功臣”论的意义	389
四 文社·宗派·性格	
——艾陈之战再检讨	393
事件重述	395
宗派之战	404
性格之战	408
余 论	418
附 录 明代诗文论争简表	425
主要参考文献	437
一 专著	437
二 论文	447
后 记	449

引 论

提出“论争”这个视角来研究明代诗文，是有感于目前研究现状的两个表现：一是研究价值确定的单元化。现代研究主要表现为革命性和通俗性，运用的是对立模式，当代研究主要表现革命性和通俗性背后的当代性（有用性），运用的是消除原有的对立模式又代之以新的对立模式。二是理论研究的静态化，即就理论来谈理论，衡量理论的精密程度和价值高下，较少考虑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复杂关系，较少考虑个人理论的变化和调整。

先看价值的单元化。

大致可从1917年算起，人们对明代戏曲和小说的研究兴趣就远远超过了诗文。说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文学”这个学科概念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舶来品，从学科建设上说，需要将那些缺失了的，或被淹没在传统文学迷雾里的组成部分重新寻找出来，鉴别、认识和评价，建立起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体系。同时，那个时代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和启蒙革命的任务，又使得向着古典向度的文学研究又要能配合现实的需要。所以，当1917年“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①的口号提出后，古代文学的研究性质就根本改变了，原有的以传统诗文为主的研究格局被打破，而转向了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可能和现实联结的戏曲和小说。自此以后，文学研究自身的科学发展要求与时代变迁中的当代需要，总是在调整着，从而铸成了现有的文学史研究状况。当时代需要压倒了科学研究后，文学史就成了不断变幻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的轮番登场表演，科学的成分就大打折扣了^①。

而在古代，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容，是杂（泛、大）文学。因此，较早的几本中国文学史，还是在传统的文学观念影响下包含了经、史、子、集等复杂内容的文学史。在明代部分，作为传统文学的重头戏和文人最为看重的诗歌古文，其比重仍然超过了小说、戏曲，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初版），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书局1915年初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等。他们大都以《明史·文苑传》、《四库全书总目》和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等清代人的评论为依据，较少自己独到的分析。由于清代人在评论时也有不少的偏见和意气成分，因此，这些著作在科学性上就需要甄别。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年初版）问世后，明代诗文相对就受到了冷落甚至排斥，而小说和戏曲被认为是白话文学的较早源头而受到新文学人士更热烈的尊重，并得到大量的深入研究。再加上西方文学观念的引入，戏剧和小说部分自然就超过了诗文^②。

① 参戴燕《怎样写中国文学史》，《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② 当然这并不是说戏曲小说的研究是从这时起。事实上，王国维早在1912年就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戏曲史专著《宋元戏曲史》（初名《宋元戏曲考》），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则说明维新派早已注意到小说在宣传思想上的巨大作用（《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第1号，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

在新文学的诸多价值观念中，有两个对明代诗文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是新，一个是俗。新是革新、革命，俗是通俗，甚至是俚俗。它们可以贯彻到文学创作的主体思想和文本的语词表现两个层面。就主体（包括团体和派别）思想言，它对倾向于打破旧有文学世界的力量予以肯定，对保守维持的力量予以否定，对向民间、大众和现实靠拢的予以肯定，对向官方、精英和古作看齐的予以否定；就文本的语词表现言，它喜欢看到的是不同于古典的通俗，与僵化的古典语词相比，它宁愿喜欢通向民间的俚俗。新、俗的观念不仅适用于戏曲、小说领域，也适用于性质不同的诗歌、古文领域。事实上，胡适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就是这两个观念普泛化的产物。总之，革命的文学和通俗的文学由于能通向现实，而受到了现代研究者的普遍青睐，相反的，就受到了批判或冷落。“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可说是新学者的流行认识。

于是，从现代开始，明代诗文研究中的宠儿，就一直是能和新文学的思想革命以及倾向民间观念相联系的公安派，他们常被冠以反复古或浪漫主义等积极名号，而与之相对的就是前后七子，他们常被冠以复古或古典主义等负面名号。对新时代的价值判断代替了对文学的历史考察。于是，明代诗文的发展历史就是两条路线——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文学的演进在研究中显得有规律的同时也简单化了。这两个观念到解放后仍然受到尊崇，并随着意识形态，特别是阶级论的进入^①，文学史研究的对立性模式得以长时间的延续。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的思想大解放，并没有立即反映到明代诗

^① 参戴燕《从“民间”到“人民”——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文研究中，对立性模式仍然存在。

90年代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论题的拓展，僵硬的对立模式受到了很大冲击。人们从原来设定的对立中，发现了他们的融通部分。以前后七子为例，以茅盾在50年代末的文章精神为指引^①，人们发现，在原来备受指责的复古外衣下，七子派其实散发着值得大书特书的革新精神，七子派实在与唐代的古文运动和宋代的诗文革新差不多，都是以复古为手段，以革新为目的，与公安派的最终方向一致。就此，一些论者将西方的文艺复兴来比较，或以为七子派发动了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或以为“文艺复兴”的还是更革命的公安派，不过，七子派“开启了”它！革命者、先行者的七子派功不可没^②。

原来僵硬的对立被打破了，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这是值得表彰的，但由此带来的新的不足，也应为人们看到。这个新的不足，就是大家都在忙着论证一个必须认可的价值。这个价值，如前所言，就是革命或革新。于是，在把七子派拉进革

① 见茅盾《夜读偶记》，其云：“我们不能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看成仅仅是‘文体’改革运动，而必须充分估计它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意义。”（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

② 见史小军《明代七子派与中国文艺复兴》，《人文杂志》1994年第6期，张胜林《明代后期中国的文艺复兴》，《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张氏把“复兴”的称号给了公安派，而前后七子是革新者、先行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推原“文艺复兴”说，当始于钱基博。他说：“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是将整个明代文学（主要是诗文）视为“文艺复兴”，而其核心就是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见其《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

命文学阵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把台阁体、八股文、性气诗（有的还包括进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塑造为革命的反面或对立。于是，我们在为七子派喜获旷代知音而庆幸的同时，又不免为与前七子对立的茶陵派前途担忧。于此，科学的人们解释说，茶陵派其实也和七子派差不多，也是反肤廓的台阁体的，并且七子派也是它开启的，值得肯定。于是，当我们再为台阁体和性气诗担忧时，人们又在讲述他们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由于公安派价值的被确定，与公安派有关的价值元素，就可能被肯定。“性灵”的被追述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于此有涉及的王世贞、屠隆就表现出其维新的一面，受到人们对此的肯定。对此，笔者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咸与维新”一词。

总之，任何一种文学，当人们研究时，都要特别地指出其能联结现实、参与当代的价值。研究的价值似乎就在于从古典中发现其当代价值，而科学地研究似乎就是既指出其“能”维新的地方，又客观指出其不“能”之处。所谓不拔高研究对象的价值，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科学地研究。譬如对七子派，人们也认为其在理论和实践、目的和结果等方面存在偏差，但似乎都同意给他们一个“平反”的决定。其间流行的一句话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①，其潜台词就是要给研究对象定性。这种定性固然有其当代意义，但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这种认定似乎又过于僵化，而可能妨碍我们对文学活动的科学解说。以前的研究把七子派和公安派塑造为绝对的对立面

① 如任访秋《何景明简论》评李何之争：“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何李二人的观点，何远远超过了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他人虽未明言，但多有此习惯思维，观其结论可知。





固然是不对的，但现在论证他们不是对立面，就一定是事实的全部吗？思路的如出一辙，可能离文学的真相尚远。因为至少在当初，公安派确实是把攻击七子派的末流之弊作为自己文学主张的对立面来提的。

可见，僵硬的对立性模式固然似乎被打破了，但对立性模式下面的对当代有用的价值观念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值此，笔者不禁想问：为什么科学研究就一定要研究它值得肯定的地方呢？为什么一定就要“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人们也许会说古为今用嘛，但笔者又想说，有没有无用之用？可不可以不按现在的眼光看？正如李贽、袁宏道等人早就指出的，古代变化了就是现在，现在变化了就是古代。一味的惟“现在”是“用”，不免亦步亦趋，始终是在打倒一个与扶起一个中忙活，难道科学的研究就是这样无聊的、周而复始去一边打倒与一边扶起？如此下去，何有穷时？

一种新观念，哪怕是偏激的新观念，也可以发现很多被陈旧意识所淹没的文学人物的文学思想。笔者并无意否定自现代如胡适以来的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以新时代需要的白话和革命为由，发现了前此被漠视和被遮掩的文学景观，如一向不被古代文人重视的戏曲、小说，如一直被清人批判甚至故意埋没的公安派，在他们的努力下，古人的光辉重现。另外，笔者也无意否定当代学者为七子派的鼓与呼。笔者只是想说，研究不需要人为去制造对立，但也不需要人为去取消。学清人熊士鹏的一个词：“还原”。尽量尽力去“还”个人、流派、集团的本来面目和精神光焰。

再看理论研究的静态化。

受体例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著作这一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大多以作家和流派为纲目，对作家和流派的主张多

以条列的方式来呈现。虽然这些确实是从众多材料中归纳、概括出来，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但是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的前后思想差异和流派之间思想融汇，却因为这种静态的罗列，而变得模糊，以致让人产生这样的误会：难道作家的思想就没有发展、变化吗？难道流派之间就如此深沟高垒，不可逾越吗？虽然著者也做过努力，在一些章节里作了交待，但体例还是妨碍了这些有关文学风尚变迁的切实信息的传达。在很多评述作家的论文中，也常见这样的处理。

众所周知，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可能不发生变化，随着年龄、职司、志趣和人生态度的变化，其对文学的看法也会改变。对明代中期的文学之士来说，更是如此。李梦阳一开始并不就是复古论者，他先有个德行论者的过程，以后也不全是复古论者，晚年的著述里也充溢着理学之德行光辉。吴中人士的趋向复古（如徐祯卿、顾璘、朱应登等），并不一定需要“北学”，其地方文学好尚里，已经包含了博古的趣味。“北学”的成果一方面是坚定了本有的高格追求，并与创作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一方面是过滤了博古中的杂质，让理论评价形态纯洁化。与个人文学思想的变化紧密联系，流派之间的关系并不全是势如水火的宗法情绪，在成为某一攻击性流派的一员之前（如唐宋派、公安派），他们有一个从前派思想（七子派）的蜕变过程，在成为流派的一员之后，他们也可能从激烈的流派情绪里退出（后期的王慎中、唐顺之、袁宏道、袁中道）。文坛大家尚且如此，普通的文学之士追逐时尚的脚步更没有停歇，他们常常出入流派之间，并不以门户之限为事。出入七子派和公安派的潘之恒等人在晚明山人的文学背景里，也许不算太出奇，但如果都像张岱的族弟，那也不免过分了。王、李风行时选王、李风格，钟、谭风行时选钟、谭风格，王、李之风





再起时，又再弃钟、谭而从王、李。“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矣。”^① 风尚总是在转，流派之限，于斯人何在？

理论研究的静态化还有一个表现，是人们总爱从纯理论的角度，来比较个人和流派之间的理论价值高下。一般而言，古代的诗文理论只有和创作实践相联系，才有足够准确的意义，但是我们在处理时，常常是理论归理论，创作归创作。于是，在李何之争中，我们无一例外地偏向了何景明，因为他主创造，反摹仿，思想灵活通达，而李梦阳反是；在唐宋派与前后七子的关系中，也倾向了前者，因为它重内容，学习重精神，而后者反是；在公安派和七子派的关系中，也仍然如此处理。于是，主创造、重内容、主变化的受奖赏，被定格为摹仿的、形式的、僵硬的就受排斥，似乎他们创作成绩的好坏、高下就由理论的好坏、高下决定了。这样的结果不免于昔日公安等人厌恶的“万人一面”、“万喙一声”。

由此也带来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在描述明代文学的发展时，总体呈现为一派压倒另一派。似乎在新的一派起来时，旧的一派就真的销声匿迹，新的一派就真的取代前派，而成为文坛新的统治者。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掩盖了文学思想演进和文学创作前行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正是有感于上述两种大的状况，笔者选择了“论争”这个研究视角。

在笔者看来，论争不仅是文学思想交流的平台，也是创作交流的平台，有着大致相同思想和创作的人们固然可以交流，

^① 张岱《柳塘文集》卷三《又与毅儒八弟》，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2页。

甚至差异甚大、分属于不同派别的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论争。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里，有着各种因素差异的人们各呈己见。如此既可以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切合文学精神的多元化和自由奔放的实质，又可以变静态的理论阐述为动态的场景描绘，体现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真实演进。

但是，设想虽好，把握它却殊为不易。因为它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论争，有共同的文学刊物发表各自的见解，显现出针锋相对的论争（或论战）特征。明人论争能体现上述特征的，主要集中在论辩双方书信的直接交流上。即使如此，有时也还存在文献的不足问题。如李何论争中李致何的第一封书信无存，艾陈之战中陈子龙书信一封也无。而其他出自于诗文集序言或诗话的论争材料，其完整性更差。

归纳而论，大约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明人（包括前人、清人）在谈诗论文时，有时并不指出批评的主名，而只是对某一群体性恶劣现象放言攻击，而实际有确定的人物存在。这是批判的广泛性，同时也是模糊性。二、当指明了批评的主名时，而要找到被批评者对此批评的反应，却并不是总能如愿。一是在他批评之时其批评人物早已下世，如风尚过后的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首领的受批判；二是他的批评行为本就没有直接传达给受批评的本人，本人无从得知，如钟惺之对公安派的不满，就是对一个乡下同学讲的。当然还有其他多种情况，影响批判之呈现为完整的往复论争。这是批评的单向性。三、当我们如愿找到了论辩双方的意见，但也可能不是说的同一问题。譬如双方都不满对方，却没有直接地交流，而只是对第三者言说对某某的看法。譬如王世贞和归有光，双方互相不满，但很少直接交流。这是批评的非同一性。四、即使双方论争的材料都留了下来，但还需确定争论的时间和背景。因为很





多人的思想会随着境遇和年龄而有大变化。这种情况在明代很普遍，如唐宋派和吴中作家群等。这是批评者自身思想的歧变性。

不过，以上这些缺憾，也正是研究明代文学论争的魅力所在。在追寻同时代的双方或多方意见时，可以隐约地见到一个更宏观的动态的文坛场景。

一人高唱，众人附和，此风一扬，彼风已抑，前波方逝，后浪已生，这就是明代文学“各领风骚数十年”的错落布景。前一个文学流派的消歇，正是后一个流派的风行，而消歇与风行之间，有着明显的承传和新变，于此不仅可以见出明代文学风尚的迁替，也可见出学术与政治格局的演化以及士人心态的转换过程。

至于局限于诗文这个范围，一是客观原因，不可能在短时间去完成包括戏曲和小小说的论争考察，二是主观原因，笔者有心想观察在传统的范围内，明代文人是如何对待它们，毕竟那时他们的重心还是放在诗文上的，俗世的名声、传世的声誉与之紧紧相连，论争很多是与此相关的。

本书首要关心的是如何呈现明代诗文论争的总体风貌，以期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是故，第一期以唐宋诗之争这种专题形式为主，在一个大的话题下，看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们各有何种不同意见，从而见出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演进。本来它在下两期中还有延续，特别是随着明诗建设呼声的越来越高，唐宋元明四朝诗合论，也会有新的较考结果，也将富有兴味。但考虑到二三期论争的激烈和多面不再是精神生活贫乏的明前期可比，也就未再作深入考察。二三期采用的是以人物和流派论争为主结合论题的专题形式，对笔者认为是明代诗文流派论争的重要问题作详细、重点地研究。对提到的每次论争力